

# 人口转移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研究

## ——基于贵州省 441 份村庄样本的分析

韦琪

安顺学院

**摘要：**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造成许多村庄“空壳化”。许多学者认为人口迁移对乡村文化振兴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目前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理论研究推论，尚缺乏经验研究支持。运用贵州省的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尝试量化测度人口迁移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状况。通过分析发现，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振兴状况差于乡土文化振兴状况；人口迁移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两个维度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文化设施的影响更深。原因是人口迁移造成村庄“空壳化”，导致村民对文化设施利用率低；人口迁移对乡土文化的传统文化传承和伦理文化维系两个维度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更深。原因是传统民间故事的工具性利用价值较低，年轻人普遍不感兴趣。还对这些结论进行一定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转移；乡村文化振兴；乡土文化；公共文化服务；贵州省

**作者简介：**韦琪（1977—），男，布依族，贵州安顺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收稿日期：**2023-08-04

**基金：**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贵州乡城人口迁移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研究”（23RWJD232）

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打造文明新风等重要举措，实现乡村文化复兴，满足乡村居民文化生活需求的集体性行动。乡城人口流动与转移重塑了近几十年我国人口城乡区域分布状况，造成许多村庄“空壳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乡村文化由此受到严重削弱。但目前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学理化推论，尚缺乏经验研究支持。本研究运用贵州省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尝试量化测度人口迁移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状况。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乡村文化振兴对人口迁移的响应效果，探索乡村文化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乡村人口人才发展策略的制定。

### 1 研究背景

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发展主义”和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标准等因素影响，县乡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乡村文化建设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关于城镇化、人口流动转移与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3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目标和重点领域。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发现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标题的文献共有1094篇，绝大部分文献是最近5年内刊出发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这一研究领域受到重视的程度。

在乡村文化振兴相关文献中，关于城镇化、人口流动转移与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也逐渐增多。其中，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乡村文化具有积极作用。一是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乡村的“主动式”城镇化将有助于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文明，形成多元化的乡村文化格局[1]。二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共同存在和相互交融，形成稳态的乡村文化并促进乡村文化复兴[2]。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对乡村文化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甚至是中性的，应看到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孙庆忠[3]认为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仍具有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乡村文化处于“形散”而“神聚”的状态。匡立波等[4]，吕宾[5]认为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不利影响。积极作用表现在城乡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民社会化，提升了农民的文化素质；推动了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激发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推动了农村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丰富了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利影响表现为加剧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使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文化市场的混乱。

但更多学者认为城镇化对乡村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尤其是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导致许多村庄“空心化”，造成乡村文化主体缺失。李祖佩[6]关注了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高度依赖外部供给，出现了供给乏力问题；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缺乏，农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刘修岩等[7]基于2000—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人口流动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但对乡风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将乡村文化区分为公共文化服务和乡土文化（或传统文化）两种类型，由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外部供给的，与人口迁移流动关联性不大，但也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体制障碍、供需契合度不高、缺少内生机制等问题[8, 9, 10, 11]。而传统文化受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大，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具有很高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如何保护和利用优秀传统农村文化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12]。应该看到农村传统文化面临村庄衰落、传承主体断裂与消融、过度开发带来的民俗趋同化发展等问题[13]。因此，要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14]。特别是，村落作为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承载着农村悠久的历史传统，需要建立政府引导机制、完善民间自治机制、创新传统功能的发展机制，重构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15]。

现有文献为研究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重要基础，虽然乡村文化振兴已经引起了大量的概念性讨论，但关于人口迁移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证研究才刚起步，现有文献很少在操作层面上检验人口迁移对不同乡村文化实践类型的影响状况。本研究尝试从村庄层面对贵州省农村人口迁移与乡村文化振兴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反映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整体概况，并通过对比乡村文化不同测量维度之间的差距及其不同村庄的差距，探寻振兴贵州省乡村文化的有效路径。

## 2 乡村文化振兴的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复合概念，内涵较为丰富。若要对其进行测量，需将这一概念分解为不同的可观察的维度和指标。首先，采用高晓琴[16]和韩鹏云[17]的分类，将乡村文化分为公共文化服务和乡土文化两种实践类型。其次，进一步将公共文化服务分为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将乡土文化分为传统文化和伦理文化。这四个方面构成乡村文化的四个维度。最后，按照不同维度可能包含的内容进行指标设计，再对不同指标赋值。这样就可以完整测量乡村文化振兴状况。

表1是从村庄层面为乡村文化振兴概念设计的测量指标体系，总体来看，乡村文化振兴包括四个测量维度：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传统文化传承和伦理文化维系，前两者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范畴，后两者属于乡土文化的内容。每个测量维度包括3个测量指标，对不同指标进行赋值便可进行具体测量。每个维度分别根据其包含的3个指标（包括多选题和单选题）的赋值情况进行分值加总，便可得到该维度的最后得分。由于每个指标赋值不一致，不同维度的最后得分不具有可比性。因而需要将不同维度的得分再标准化为1~10的系列数据，使得不同维度之间的分值能够进行相互比较。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2年12月对贵州省各地州市的实地调查。调查员主要是安顺学院学生，调查对象包括村干部和村民，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最终获取有效的村庄问卷441份。调查内容包括村庄基本特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使用、传统文化传承状况、伦理文化维系状况等。从村庄整体反映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状况，特别考察了人口转移差异状况在

乡村文化振兴方面的差异。

### 3 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总体概况及不同维度对比

为了客观把握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总体状况，并对乡村文化不同维度振兴状况进行比较，计算出了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四个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从表 2 的计算结果来看，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振兴均值总体上明显低于乡土文化振兴，且标准差较大。表明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不够理想，同时不同村庄之间的差距比较大。这是因为，公共文化振兴主要依靠外部输入，在村集体经济较弱的情况下，实际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全面开花，而只能选择重点村庄投入，比如中心村或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村寨，但课题组的调查却包括非中心村和无特色的村寨。这就导致乡村文化振兴总体状况不够理想，且不同村庄出现较大差异。

#### 3.1 贵州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振兴现状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两个维度之间的比较来看，表 2 显示，公共文化设施得分均值仅（3.77 分），明显低于公共文化活动得分均值（5.35 分），且相对均值而言，其标准差也较大，分别为 2.12 和 2.28。说明公共文化设施总体得分不高，且村庄之间差异较大。调查中发现，由于自然村合并为行政村之后，许多文化设施都建设在中心村，而非中心村的文化设施较少。但课题组的调查主要以自然村为对象，非中心村在文化设施上得分较低，拉低了整体样本的文化设施均值，也使得不同村庄的文化设施差距较大。而对于文化活动，非中心村的村民也可以而且鼓励参与行政村活动，因而得分高于文化设施。

贵州省地形地貌复杂，省内沟壑纵横、平地较少。一些村庄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公共文化设施较齐全，文化活动也较多。而另一些村庄修建在陡峭的半坡上，无法修建篮球场、表演场地，修建这些文化设施也不经济。村民之间居住分散，难以利用村庄公共文化设施。在安龙县打酉村调查发现，行政村文化设施主要建在中心村大寨，村寨中央有一个文化广场，走进广场，正对面是表演台，广场四周是中国孝文化、当地民俗文化、村规民约等文化墙文化碑。广场周边还建有文化廊、重要民族节日场景的浮雕。原先位于寨子中间的村小学现已改为村支两委办公室、村史馆、文化活动室等。然而在非中心村，比如纳冗村，其村民居住比较分散，文化墙这些没有办法安排，只能在村子中间空地建了一个篮球场，而篮球场实际与每个家庭户都有一定距离，所以篮球场基本是常年空置，无人使用。中心村与非中心村之间文化资源非均衡分布，这是村庄地理条件、村民居住格局以及基层财政不足所致。但即使在非中心村建设了同样的文化设施，其闲置率更高，造成资源浪费，在贵州省这种情况比较多。事实上，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基础文化设施是否齐全和分布均衡问题，而是文化活动较少导致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应优先思考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表 1 乡村文化振兴相关指标设计与测量

测量维度	指标	指标赋值
		(1) 文化墙（长廊、广场）(2) 农家书屋（农民讲习所）(3)
公共文化设施	1. 本村有哪些文化设施或文化活动场所（可多选）	老年活动中心(4) 村文化陈列室（村史馆）(5) 学校(6) 停车场(7) 篮球场(8) 舞蹈表演场地（舞台）(9) 其他（请注明）
	2. 本村文化设施或文化活动场所变化情况	(1) 比以前更少更差(2) 没有多大变化(3) 比以前更多更好

	3. 现有的文化设施使用情况	(1) 不使用 (2) 很少使用 (3) 有时使用 (或有的使用有的不使用) 4) 经常使用
		(1) 歌舞戏剧表演 (花灯、地戏、山歌等) (2) 打篮球/其他运
公共文化活动	1. 村民休闲娱乐活动有下列哪些 (可多选)	动 (3) 看电视 (4) 打麻将 (扑克、字牌) (5) 上网 (抖音、微信) (6) 聚集聊天 (打平伙、喝酒) (7) 其他 (请注明)
	2. 相比以前, 本村文化活动和节日氛围发生何种变化	(1) 比以前更差 (2) 没有多大变化 (3) 更加丰富多彩
	3. 本村各种活动经费是否充足	(1) 否 (2) 不确定 (3) 是
传统文化传承	1. 本村年轻人对本地方或本民族历史及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是否感兴趣	(1) 很不感兴趣 (2) 较不感兴趣 (3) 一般 (4) 较感兴趣 (5) 很感兴趣
	2. 本村是否举办或参加文化传承项目培训	(1) 没有 (2) 不清楚 (3) 有
	3. 本村各种文化传承培训是否有经费支持	(1) 没有 (2) 不清楚 (3) 有
伦理文化维系	1. 本村年轻人孝顺父母情况	(1) 很不孝顺 (2) 较不孝顺 (3) 一般 (4) 较孝顺 (5) 很孝顺
	2. 本村多数家庭兄弟妯娌关系情况	(1) 很不好 (2) 较不好 (3) 一般 (4) 较好 (5) 很好
	3. 本村年轻人对村庄长辈尊敬程度	(1) 很不尊敬 (2) 较不尊敬 (3) 一般 (4) 较尊敬 (5) 很尊敬

注：“指标赋值”一栏，选择项序号即计为该指标得分，多选题则为每选一项计为1分，最后得分即所有已选项目加总。各维度得分由其所包含的所有指标得分加总，再标准化为0~10。此外，没有合作社的村庄在这一项得分为0分；没有产业项目的村庄在这一项得分为0分。

### 3.2 贵州省乡村乡土文化振兴现状

从乡土文化的两个维度之间的比较来看（表2），传统文化传承得分均值为6.90分，低于伦理文化维系得分均值的（7.55分），且标准差为1.77，大于伦理文化维系的标准差（1.33）。说明贵州省乡村在乡土文化振兴方面，传统文化传承差于伦理文化维系，且不同村庄之间的差异较大。

传统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支持，现代社会是一种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是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其前辈的时代，即文化反哺。年轻人被新知识新技术新文化吸引，老年人需要向年轻人学习，传统文化逐渐衰落。“后喻文化”还使得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影响伦理文化维系。好在许多年轻人虽然走出村庄到城市务工，但其生活预期还是在年老的时候回到原村庄继续生活。因此，在伦理文化维系方面还不敢松懈，这就导致了伦理文化维系比传统文化传承的得分要高一些。当然，不同村庄也会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在传统文化传承培训方面，有文化特色的村庄肯定就能获得更多培训资源

和经费，进而扩大了不同村庄之间的差距。

表 2 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总体状况

文化类型	测量维度	均值	标准差
公共文化服务振兴	公共文化设施	3.77	2.12
	公共文化活动	5.35	2.28
乡土文化振兴	传统文化传承	6.90	1.77
	伦理文化维系	7.55	1.33

注：根据乡村文化振兴不同维度标准化得分即 1~10 分进行计算

## 4 贵州省人口转移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

人口流动迁移对乡村文化振兴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人口流动迁移或城镇化对城乡文化交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和乡村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更多是对乡村文化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导致村庄“空壳化”，乡村文化主体缺失的局面。本次调查基本验证了这一判断。为了反映人口流动迁移对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根据村庄外出人口比例将人口迁移分为三个层次：外出人口占比 50%及以上、30%~49%和 30%以下，再用这三个层次与乡村文化振兴状况进行交叉分析，以此反映不同外出人口比例状况之间的乡村文化振兴差异。

### 4.1 人口转移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振兴

表 3 显示，人口迁移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两个维度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文化设施的影响更深。首先，外出人口比例低的村庄，文化设施振兴和文化活动振兴都略高于外出人口比例高的村庄。因为外出人口比例越低，村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在“中”和“多”这两列的比例依次越高，而在“少”这一列的比例则越低。其次，无论在哪一个外出人口比例层次上，文化设施在“少”这一列的比例都超越 80%，而文化活动则都在 70%以下。相反，在高分段的“中”和“多”两列则文化活动的比例都相应地高于文化设施。说明在乡村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贵州省乡村文化活动振兴状况好于文化设施振兴状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文化设施主要依靠基层政府供给，但由于基层财政有限，许多村庄特别是非中心村的文化设施还比较少，而人口外出比例高的村庄，更少使用现有文化设施，从而拉低了文化设施振兴状况。对于文化活动而言，即使主要是在中心村举办活动，非中心村的村民也可以参与，因而文化活动得分比文化设施要高一些。文化活动振兴主要受制于活动经费，特别是村庄集体经济较弱、而人口外出比例较高的村庄，文化活动也相应较少。因此，文化活动振兴方面也仅是好于文化设施，总体情况仍不理想，没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

表 3 不同村庄外出人口占比与公共文化服务振兴交叉分析表（单位：%）

文化设施振兴	文化活动振兴
--------	--------

		少	中	多	少	中	多
	50%及以上	85.7	11.1	3.2	66.7	17.0	16.3
外出人口占比	30%~49%	83.4	12.1	4.5	63.7	18.4	17.9
	30%以下	80.7	14.0	5.3	63.5	19.0	17.5

注：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的得分统一变成1~10之间的数值之后，再根据这一数值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0-5.9为“少”，6~7.9为“中”，8以上为“多”，以表示差到好的不同的振兴状况。

#### 4.2 人口转移与乡土文化振兴

表4显示，人口迁移对乡土文化的两个维度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更深。传统文化传承在“强”和“中”这两列的最高比重均没有超过40%，而伦理文化维系在这两列的比重均超过40%。相反，传统文化传承“弱”的比重则远高于伦理文化维系在这一列的比重。说明在乡村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贵州省乡村伦理文化维系状况好于传统文化传承状况。

虽然乡村传统文化和伦理文化两者都是实践性文化类型，但是显然伦理文化维系的实用价值高于传统文化传承。所谓“实践性”文化类型是指这种文化是通过人们共同实践产生和发展的，离开人们的共同实践和相互认同，这种文化就会遭到削弱，甚至消亡。而人们在共同实践中往往会选择具有更大实用价值的文化类型进行传承和维系。从实用性来说，传统文化比如先民的故事和传说的实用价值低于伦理文化，因此最终导致伦理文化维系状况优于传统文化传承。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许多村庄的长者和年轻人接触不多，还能记住当地民间传说和故事的长者没有机会将其传给年轻一代，而由于许多传统文化的工具性利用价值不高，大多数年轻人对本地传统民间故事并不感兴趣。但大多数外出务工的村民表示今后还会回到村庄生活，尊老爱幼对维系村庄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村民应该遵守的人生准则。因而，乡村伦理文化维系仍然具有相对更高的工具性利用价值。

表4 不同村庄外出人口占比与乡土文化振兴交叉分析

(单位：%)

		传统文化传承			伦理文化维系		
		弱	中	强	弱	中	强
	50%及以上	38.1	33.3	28.6	6.4	43.9	49.7
外出人口占比	30%-49%	29.0	36.2	34.8	5.3	43.0	51.7
	30%以下	24.6	39.2	36.3	3.2	45.0	51.8

注：传统文化传承和伦理文化维系得分统一变成1~10之间的数值之后，再根据这一数值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0~5.9为“弱”，6.0~7.9为“中”，8以上为“强”，以表示从差到好的不同的振兴状况。

##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调查数据计算了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两种文化类型和四个维度均值状况，对比分析人口迁移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传统文化传承与伦理文化维系之间的差异，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一是贵州省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振兴差于乡土文化振兴。这一结论与阎云翔[18]在黑龙江省下岬村的调查和吴理财等[19]在安徽省的调查结论一致，但与高晓琴[16]和韩鹏云[17]的观点相反。前二者认为，当下中国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较为丰富，而公共文化生活却日益式微。乡村公共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乡村文化主体缺失（或缺位）、文化服务匮乏和供需错位、文化体制和机制落后、文化建设投入不够、优秀民间文化流失、农民价值观受到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影响等方面[20, 21, 22]。后二者则认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一直得到强化，而乡土文化作为内生型的文化样态却面临着“无主体”的现状和不断衰弱的趋势。调研发现，两者衰落的原因都与人口迁移相关，说明人口迁移对两种文化类型均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强度可能不同。调研组的调查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是人口迁移对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两个维度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文化设施的影响更深。说明在乡村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贵州省乡村文化活动振兴状况好于文化设施振兴状况。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造成村庄“空壳化”，导致村民对文化设施利用率低。

三是人口迁移对贵州省乡土文化的两个维度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更深。说明在乡村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贵州省乡村伦理文化维系状况好于传统文化传承状况。主要原因是村民外出务工或在村庄生活，当地传统民间故事对其现实生活的工具性利用价值较低。而伦理文化维系之所以较好，是因为村民未来生活预期是回到原来的村庄继续生活。

上述三点结论说明贵州省乡村人口迁移尤其是人口外出务工对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不利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对不同文化类型和维度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人口迁移导致村庄“空壳化”，致使乡村文化振兴缺乏村庄内部承接主体，乡村组织能力弱化，村庄集体无能力组织文化活动，只能机械应付基层政府的文化供给任务，无法反映村民实际的文化需要和诉求。而城市文化进一步向乡村延伸，还可能导致狭隘个人主义蔓延、公共舆论沉默、孝道衰落等，进而阻碍乡村文化振兴。

为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重点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经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前提基础。仅靠政府财政投入，资金来源有限，难以持续。必须动员市场力量和农民主动参与并自愿提供相应经济支持。二是加强基层政府组织能力建设，赋予乡村文化建设持续动能。基层政府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创新乡村文化模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发挥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引导扶持作用。三是建设村庄社区共同体，打牢乡村文化振兴基石。村庄尤其是自然村庄是村民共同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孕育传统乡土文化的场域。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重建村庄凝聚力，形成集体行动力，才能推动乡村文化恢复、重建和创新发展。四是健全乡村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汇聚各方文化人才。振兴乡村文化，人才是关键。紧扣国家人才政策，完善和创新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等体制机制，优化乡村文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乡村文化人才活力。

最后，还必须认识到，上述几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关系。经济基础薄弱，文化设施就难以均衡发展，文化活动也无法开展。村庄社区凝聚力差，集体行动力难以达成，难以争取文化资源支持。而缺少人口，则文化设施利用率低，文化活动困难，进而又导致社区居民联系减少，不利于形成社区共识，无法形成集体行动。总之，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使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持同频共振，使农民个体确立理性认知、产生情感共鸣，乐于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 参考文献

- 
- [1] 钱悦斐, 杨新海. 苏南乡村地区“主动式”城镇化复兴之路——以无锡市锡北镇斗山地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11):105-112.
- [2] 张琪, 汲忠娟, 曾仁辉, 等. “旅游绅士化”与农耕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地元阳梯田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6):75-81.
- [3] 孙庆忠.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J]. 江海学刊, 2009(4):136-141, 239.
- [4] 匡立波, 黄向阳. 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 2012, 40(3):1828-1830.
- [5] 吕宾. 农民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1-5.
- [6] 李祖佩. 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J]. 中州学刊, 2013(6):72-77.
- [7] 刘修岩, 王彩艳. 城乡人口流动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浙江学刊, 2023(1):160-170.
- [8] 张天学.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江苏省徐州地区农村的调查[J]. 农村经济, 2010(6):84-88.
- [9] 李少惠, 崔吉磊. 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生机制的构建[J]. 经济体制改革, 2007(5):175-178.
- [10] 徐双敏, 宋元武.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契合状况实证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5(5):67-75.
- [11] 孙浩.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1(6):59-70, 124.
- [12] 赵岚. 保护优秀传统农村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J]. 农村经济, 2010(2):122-124.
- [13] 郝国强, 周玮杰.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78-84.
- [14] 余俊渠, 秦红增.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3):63-69.
- [15] 贺一松, 王小雄, 贺雨昕, 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与重构——基于江西莲花县村落祠堂的调研[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 18(6):822-828.
- [16] 高晓琴. 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6):87-96.
- [17] 韩鹏云.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样态与发展导向[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2):61-71.
- [18]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19] 吴理财,夏国锋. 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07(2):62-69, 81.

[20] 郑风田,刘璐琳.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112-115.

[21] 龙文军,张莹,王佳星.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解释与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12):15-20.

[22] 陈晓霞.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建设[J]. 理论学刊, 2021(1):141-149.